

第四节 建立人民抗日武装

1938年11月中旬和1939年4月中旬，中共中山县委先后在石岐太原第和四区（今火炬开发区）江尾头两次召开抗战时期武装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县委委员和部分区委的负责人。会议认真学习了党中央的一系列文件精神，确立了中山的工作中心是加紧准备武装斗争，准备以五桂山作为将来的游击根据地。第一次武装工作会议提出了要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做准备，决定举办党员和游击干部、青年、妇女训练班，培训开展游击战的干部和骨干，掌握一定的武装，以中中别动队为基础，建立一支县委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第二次武装工作会议决定以三种形式筹建由党领导的武装：一是筹建由县委直接领导的骨干武装，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人员、武器、地盘和给养等问题，这支队伍要在党的领导下，以八路军、新四军为建军榜样，锻炼成为一支具有坚强的意志、铁的纪律、训练有素，能在任何艰苦条件下进行英勇战斗的人民军队；二是选派党员进入国民党和地方团队，利用其在国民党的地位，挂国民党部队的招牌，发展中共的武装力量；三是加强和扩大由党控制下的乡村自卫队武装。如乡警队、更夫队、自卫队等，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借壳发展武装力量^①

1937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制定的《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指出：“利用一切旧政权的武装组织形式，如民团，保安队，壮丁队，义勇军等，实行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共产党员应该以抗

^① 本小节主要史料引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216页。

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①中共中山县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精神，一面广泛进行抗战的宣传发动，一面探讨建立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可行途径，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号召党员大力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当时在个别学校中建立了有武装的别动队，在农村掌握一些更夫队、自卫队等。

1938年底，中山青抗先的成立，促成了中山青年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个高潮^②。这一时期大批的青年加入到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军队，帮助军队加强政治工作、改造国民党军队、强化抗日救国意识宣传。

1938年11月中旬的第一次武装工作会议上，九区区委提出，三、九区的地方团队^③正在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声称如有人、枪就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领番号，可趁此机会打入该团队，组织一支抗日武装。县委从建立抗日武装的目的出发，结合本县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步步高涨的有利形势，认为这是一种既可隐蔽组织又可公开活动和扩大队伍的好办法。经过慎重研究，批准了九区的计划，强调“挂国民党招牌，办共产党的事”。还明确这支队伍是县委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由县委指挥，日常工作则由九区区委照管。1938年12月，九区区委按照县委确定的方针，根据本地区有农民运动的基础，向九区地方团队领了一个黄礼大队属下的“别动小队”的番号，由当地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的梁伯雄担任小队长，副队长为郭定华（郭苏永）、吴二根（三人均是中共党员），队员由各乡党支部选送。梁伯雄小队建立后，在九区区委的直接领导下，队伍发展很快。为了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县委派党员杨日韶负责小队的党组织工作和统战工作。九区区委又从各支部抽调部分党员到队伍里，并动员了纯朴可靠的农村青年参军。1939年初，该小队在民利

① 摘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页。

② 中山青年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二个高潮发生在1944年夏天。详参本章第七节《建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

③ 该队伍于1940年7月改编为国民党第四战区挺进第三纵队，同年10月改编为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

公司^①领取潘惠大队^②下的一个中队番号。同年3月,在中队的基础上扩充为大队,又称为梁伯雄大队^③,大队长梁伯雄,大队副队长陈军凯、徐云,副官杨日韶。大队部设在九区牛角。

掌握地方团队的武装是一个重要方式。中共中山县委还派党员打入国民党中山县警察局、县守备队内部。1939年初,孙康通过统战关系,领取了中山守备队总队巢添林大队辖下的第九中队的番号。中队长、指导员等骨干均是青年党员。

1940年底,中共中山本部县委派杨子江、邓展明、黄石生、黄社雄、梁其颖等一批青年共产党员利用统战关系组建地方武装。一区长洲乡青年中共党员黄社雄通过亲友关系,向“民利公司”第二支队陈球大队领取一个中队番号,称“黄社雄中队”,自任中队长,公开在一区长洲一带活动。中山本部县委又派一区、二区区委代理书记杨子江返回二区组建武装,建立据点。在一没有钱、二没有枪的情况下,杨子江回到家乡申明亭村,找到二区联防办事处主任郑健驹,通过毛遂自荐得到一个职位,取得郑的信任,逐步掌握了这支武装,并掌握了申明亭更夫队,后安插了吴子仁、卢德耀、肖杰华(梁德)、郑吉等中共党员在这支队伍。杨子江还把大河哨所的围馆扩建成一个营地,使之成为公认的杨子江部队的基地。1941年,青年中共党员黄石生、周增源分别担任一区和二区国民兵团的常备中队中队长。以上四支武装队伍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活

① “民利公司”是沦陷初期中山三区、九区的地方势力潘惠、梁自带等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堂口,成立时因沙田区的人大都不识字,就让当教师的梁伯雄帮忙起名,梁说“要为民谋利,就叫‘民利公司’吧”,故名。这些武装是封建式的地主武装,盘踞在中山沙田及民田区一带,走私、开烟赌馆,勒收田赋,无所不为,被称为“大天二”。后为求地位更稳固,潘、梁等各自又在国民党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领取番号,这支队伍军纪散漫,每个部队都没有赌档,对抗日的态度也非常复杂,有的抗日较为积极;有的略为消极,但又不致投敌;极个别的则投靠了日本人,挂上伪军的招牌。因此,其中大多数可称为抗战时期的“消极保守力量”或“中间力量”。

② 1940年7月,潘惠领取了国民党第四战区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的番号,同年10月改编为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

③ 梁伯雄大队的番号为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为梁伯雄,故按当地习惯,称为“梁伯雄大队”。

动在二区及城郊西北部一带，逐步形成了民田地区与沙田地区相呼应，建制部队与民兵武装力量相结合，发展武装队伍与开展青年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形势，成为共产党所掌握的中山抗日武装重要的一翼，为党在县城近郊的工作扎下了深厚的根基。

四区合水口里乡爱国华侨刘智明（刘震球）在四、六区区委书记邓展明帮助支持下，建立了一支有20多人（枪）的民兵集结队。为使“刘震球集结队”有公开合法的社会地位，1941年秋，在杨日韶的帮助下，刘震球向国民党四区区长陈思危领取了中山县民团第四特务大队第三中队的番号，刘震球任中队长，邓展明任中队指导员。这支队伍成立后，积极支持配合中山抗日游击队在五桂山区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青年黄乐天同乡的中医李泽霖在九区阜圩行医，挺进第三纵队（下称“挺三”）第三支队队长梁自带的总部就在其中药铺的斜对面，因而同“民利公司”的头目很熟络。1941年7月，欧初、黄乐天动员其到梁自带处领一个番号，建立一支武装队伍，条件为如果梁自带给一个番号，就同梁合股耕种在鸡头角的七顷土地。李泽霖接受了欧初的建议，找梁自带洽谈。梁见有利可图，便将挺三第三支队独立四中队的番号给了李泽霖。考虑到李要行医，不使用本名建立武装，欧初又提议其用化名“李志海”建立中队，李泽霖任挂名中队长，由游击队派人去当副队长。后来该中队成为中山抗日游击大队的主力之一。

八区工委也在积极发展抗日武装。青年党员陈中坚的叔父陈世典是月坑村的大地主，其为人思想开明，倾向抗日。1939年底，陈中坚利用其叔父的关系，在马墩组建了一支脱产的护沙队。这支队伍名义上是陈世典的护沙队，实质上是八区工委领导的一支抗日游击武装。中共八区区委又利用同挺三第七支队副支队长陈培光的关系，将马墩护沙队编入挺三，人数扩充至七八十人，番号是挺三第七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陈中坚（时年26岁），党代表兼副大队长郑少康（1943年4月郑少康调往番禺后，由唐健任政委），大队副官黄乐天、梁其靖。1941年4月，中心县委决定，队伍改名为中山八区抗日游击大队。同年7月，曾谷（时年27岁）在东澳乡草朗村组建了东澳乡人民抗日义勇游击队独立小队。此外，中共乾务支部书记梁其靖按区委指示，以绵泽堂干事身份，出任绵泽堂护沙中队中队长。区委把赵明小队调驻乾务沙面，编为绵泽堂护

沙中队第三小队。

这些武装都是全面抗战初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思想下建立，由中国共产党党员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大批中山的爱国青年积极参与到这些队伍中来。

举办游击训练班

1938年11月中旬，中共中山县委在第一次武装工作会议上确立了加紧准备武装斗争的工作中心后，同时着手举办党员和游击干部、青年、妇女训练班，培训开展游击战的干部和骨干。

1938年底，中共中山县委在四区西桠的县立七小举办第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学员来自各区党支部干部和武装骨干，欧初、卢德耀、谭光耀等50多名青年人参加了这期游击训练班。游击训练班按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下称“抗大”）的管理模式，实行军事化，过集体生活。学习内容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罗瑞卿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做思想上的准备。1939年初，县委又举办了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与此同时，县委还在石岐、三区、五区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抗日救护训练班，请当地医生讲授战场救护知识，培养一批战地救护人员。一、二、四、五、八、九区区委先后掌握了一定的武装和开展了培训游击干部的工作，如一区区委在长洲举办的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和五区区委在南屏乡举办的游击训练班，均由青年中共党员黄石生任军事教员。四区也办了几期游击干部训练班，由青年谭桂明、方群英、吴子仁等负责。八区区委在南山举办青年游击训练班，学员是来自各乡的抗先队员，共80人。学习结束后，各培训班学员便返回各乡村去组织抗日武装，发动广大农村青年积极参与。

中共中山县委利用了当时抗日救国的大环境，组织武装队伍，掌握了一批取得合法地位的乡村武装。1938年底，中山县别动大队成立，大队长孙康，副大队长欧晴雨（后脱党）、缪羽天，队员有两三百人，其中中共党员约100名。四区区委建立的四区抗日别动队有60人，其中一半是共产党员，这是一支完全受中国共产党指挥的不脱产的群众抗日武装。各区、乡也建立了一些由党员掌握或参加的不脱产、半脱产的自卫队、沙夫队、老更队。中共中山组织初步掌握群众武装的乡还有：

四区崖口乡、沙边乡，一区长洲乡、员峰乡、张溪乡（乡警队）；五区大布乡、八区月坑乡（农民组织，如更夫队、乡警队、农民自卫队等），这些队伍的武器大部分靠华侨捐款购买。

组建抗日游击队

中山的抗日斗争是从敌强我弱的极其困难状态下，通过浴血奋战，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发展起来的。这里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支援、参与，有无数青年的奋起英勇杀敌。

国民党中山县党、政、军当局在日军进犯时不战而退，逃到鹤山建立临时县政府，因而失去民心。国民党中山县县长吴飞于1940年5月辞职。继任者顽固派林卓夫无法维持政务，于同年12月因财力不继辞职。国民党中山县党政当局已无力领导中山敌后抗战。

领导中山人民抗日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中共中山县委在1938年把组织别动队作为抗日武装的主要形式。至1939年1月，全县已组建别动队近300人（枪），其中共产党员100多人。该武装配合中山地方守军，取得两次横门保卫战的胜利。中山沦陷的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山敌后人民抗日武装有：中共一二区区委、四区区委、六区区委领导的乡警武装有数十人，八区陈中坚抗日游击队有20余人，九区区委驻九区梁伯雄大队内掌握了二三十人的队伍，力量仍十分弱小，活动相当困难。

1940年5月下旬，中共中山县委副书记梁奇达安排中共党员欧初（时年19岁）到大南沙负责组建中山抗日游击小队。接到任务后，欧初即着手队伍的筹建工作。县委陆续从一、四、五、六区，抽调郑刚拔（后叛变）、罗章有、谭帝照（谭三九）、冯洪昌（冯昌）、李新知、缪羽天、邓准、陈超、郑毅、陈庆池等13名青年人到九区大南沙，成立了中山抗日游击小队，小队长郑刚拔，党代表欧初。部队对外挂国民党挺三第一支队梁伯雄大队新建小队番号。

为了充实加强这支党直接领导的武装，1940年6月，四区区委书记谭桂明（时年24岁）带领崖口乡乡警队10余人，一区区委书记黄江平带领长洲乡乡警队10余人，到九区与转移到牛角沙的县委新建抗日游击小队合并。随后从各区抽调来一批战士，队伍发展到四五十人，扩编为抗日游击中队，并成立了党支部。中队长杨日韶（时年22岁），

党代表谭桂明，政训员欧初。这支全部以青年组成的队伍，在生活极其艰苦、经常缺衣断粮的情况下，仍坚持组织学习政治和军事技术，开展群众工作，锄除奸伪。不久，上级组织派卫国尧到这支队伍负责军事工作。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山抗日游击队逐步站稳脚跟。

1940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将中共中央派来的延安抗大三分校大队政治委员谢立全（又名陈明光，时年23岁）、大队长谢斌（又名刘斌，时年26岁）分配到珠江三角洲地区负责军事工作。同月，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在碧江召开会议，决定加强南（海）番（禺）中（山）顺（德）敌后各抗日武装的领导，深入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以顺德抗日游击队为基础，从中山、番禺抽调一批党员、青年组成独立一中队，编入广州市区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下称“广游二支队”），由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独立第一中队中队长林锵云、政训员黄柳言。不久，又建立了广游二支队第一中队，中队长肖强、指导员欧初。

中山抗日游击小队（后扩为中队）十分重视对战士进行抗日救国和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党员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帮助当地农民种田，保护群众利益，与群众建立了亲密关系。中心县委为了更好地发动九区群众，配合部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先后派谭本基、容海云、方群英、邝健玲等一批青年妇女干部到九区工作。这批妇女干部通过办识字班，组织妇女会、姊妹会等，团结了一批九区妇女，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

中山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为日后开展中山敌后游击战打下了基础。到1944年10月1日，在中山五桂山成立的人民抗日武装中区纵队已发展到2700多人，大批的中山爱国青年成为英勇的游击战士。^①

^① 以上两个小节主要史料引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页及第212—214页。